

發表人爲計劃成員 但昭偉教授。本文預計刊登於《通識在線》，26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年1月。

美國通識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Daniel Bell 的觀察

但昭偉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

Daniel Bell 在《通識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中的第二章〈最初情況〉(*The Original Assumption*)中，所做的是不外是「回顧與反省」的工作。由於這本書本來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爲檢討通識教育而託負的工作成果，Bell 花了比較多的心思在回顧哥大推動通識教育過程中的周折。相較之下，他雖然也花了相當篇幅交代了芝加哥大學及哈佛大學發展通識教育的情形，但他的取材稍顯灰隘單薄，其周詳完整也不如對哥倫比亞大學的交代。在說明了三所大學發展通識教育的大要之後，Bell 提綱挈領的交代這三所名校在通識教育的共同發展背景、歷史脈絡及內涵性質，並順便說明三校在實際作法上的差異。在第二章的後半部，Bell 以他社會學家的敏銳，剖析了通識教育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突顯出來的重要意義，他的分析指向了大學理念的變化、通識教育發展方向的糾葛、大學組織運作與通識教育的連動。Bell 在這章的論述，不免的會刺激台灣讀者投身去反省本土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歷程、脈絡及基本性質，這種「回顧與反省」的工作，對一路走來艱辛坎坷的通識教育要如何繼續往前邁進，想必是一項必要的任務。

仔細的讀 Bell 的這本書，可以讓我們大略的掌握美國通識教育的發展過程。其中有幾點特別值得一提。

民主社會的分裂與共識凝聚

由於教育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緊緊相扣，所以當人類社會在面臨政經和社會的困境時，總會想藉由教育來解決。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也可循此線索來了解。根據 Bell 的交代，哥倫比亞大學廣爲人所知的通識教育課程「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就是美國政府在面臨人民在第一次大戰中可能分裂的危機而發展出來的課程。稍微詳細一點的說，由於美國是個移民國家，長期以來湧入大量歐洲各國的人民，歐洲各國之間的紛擾，也不斷的挑撥著身在

美國的各國移民的神經（比如愛爾蘭移民對英國政府即持有歷史上的仇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歐洲各國分成兩大敵對的集團，而身在美洲的各國後裔不免的會有選邊支持的現象，後來美國政府終而與英法結盟、不情不願的加入了歐戰！第一次大戰的方興未艾，嚴重的撕裂美國大眾之間的情感（試想一個德裔的美國人和一個英裔的美國人會對戰爭有多麼不同的反應），美國政府此時認為有必要讓全國人民了解戰爭的目標，於是成立了一些宣傳機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 J. E. Woodbridge 受託於美國政府，編寫了一套教材（即 War Issues Course），在哥倫比亞大學及全美的學生預備軍官團中心進行教學。約略在同一時間，哥倫比亞大學的另一批教授，覺得有必要開設與戰爭議題相對的「和平議題」課程（Peace Issue Course）。哥倫比亞大學於是在 1917 年的秋季班，將這兩項課程合併成「當代文明」這門課，且是大學新生的必修課。我們透過 Bell 的介紹，才了解美國高等教育中鼎鼎有名的「當代文明」的通識課程，竟意外的是因應第一次大戰而出現的產品！

除了「當代文明」是型塑社會精英共識以便齊一對外的產物之外，美國的有志之士在面對民主社會的多元發展，也亟思以大學、乃至中學的「通識教育」來建構社會的共識。Bell 在介紹哈佛大學紅皮書（The Red Book，亦即《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時，特別告訴讀者：紅皮書的執筆人強烈認為美國社會的高等教育需要有一致的教育目標和理念；紅皮書的作者不僅關心美國高等教育中的通識課程，也更關心中等教育的課程內容。

為什麼哈佛大學關心大學乃至中學的通識課程？為什麼他們認為高等教育需要有一致的目標及理念？Bell 告訴我們，原因主要出現在美國中等教育的品質長期以來就良莠不齊，更嚴重的是中等教育無法提供共同的學習內容（common learning），這使得美國人民在心靈上產生嚴重的斷裂和歧異。這斷裂和歧異是從何而來？紅皮書的執筆教授的答案是：由於中學沒有大家都要共修的課程，而大部分的人在讀完中學之後就不會繼續升學，使得美國人民的共識難以凝聚，也使得受過高等教育的少數精英份子與廣大的美國人民之間產生了鴻溝。為了彌補這種鴻溝，所以紅皮書作者在二戰之中所思考的問題，就是如何從中學及大學中的通識教育著手，來建構社會的共識，以避免民主社會的分裂。

通識課程的設立有利民主社會共識形成、避免國家或社會的分裂，還可見諸於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理念。眾所周知，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理念有濃厚的赫欽斯（R. M. Hutchins，1925 年至 1950 年間實際領導芝加哥大學）色彩，但許多人也許不知道的是，Bell 告訴我們，實際在芝加哥大學運作的通識教育卻與赫欽斯的理念有段距離。赫欽斯在 1936 年勾勒出來的通識理念和經典教育，並沒有在芝加哥大學實現，反而是在 St. John's 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找到根據地。雖然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沒有依循赫欽斯的理想，但芝加哥大學通識教育的目標之一，始終都是共識的凝聚，不論學生的背境或興趣為何，也不論他們有著什麼樣不同的生涯規劃，芝加哥大學的大學生都需要修習共同的通識課，在這方面，學生沒有選修的自由。

大學的轉變及啓蒙理念的堅持

除了面對民主社會分裂的危機之外，通識教育在美國的推廣還與大學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根據 Bell，十九世紀末葉，美國的大學開始受到德國大學的影響。當時德國大學開風氣之先，力倡大學的主要任務除了是知識的傳授之外，更在於研究，也就是知識的創新和專精。Bell 在說明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發展時，特別提到在哥大的成長過程中，也曾一度朝德國式大學的方向傾斜。根據 Bell 的研究，哥大在 1763 年創建時，走的是牛津大學的學院模式，但到了 1905 年，當時校長 Nicholas Murray Butler 則宣告哥倫比亞大學要朝專精化的方向邁進，改變的方向大致是將原來四年制、以通識博雅為核心的大學教育縮短為兩年，大學的第三、四年則以專業訓練或專精知識為主。Butler 的想法遭到哥大教授的反對。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初，是哥倫比亞大學走在歷史分水嶺的關鍵時刻。

但令許多人驚訝的是，看來當時代表進步與保守的兩派爭端，到頭來卻由保守路線獲得勝利。挾大學校長職務與時代精神的 Butler，在當時並沒有獲得董事會的支持，支持保守路線的人以為，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還是在學生智能的發展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大學教育的主要活動是「教人」，而不是專精的訓練或職業的準備。根據 Bell 的描述，一次大戰前的哥大雖然悍然的抗拒把專精訓練當作大學的主要活動，但卻也不得不與另一股時代潮流作妥協。原來，哥大本以牛津大學為典範，把古典語文(希臘文及拉丁文)當作是入學的門檻之一，這樣的要求自然會對某些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形成一種限制，能夠符應如此入學要求的人，大多來自私立中學及中上社經背景的家庭。但在社會變遷的壓力下，1897 年哥大首先放棄希臘文做為入學條件之一，但仍保存拉丁文的要求，但取得文學士的要件仍包括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精熟。這種古典的要求在廿世紀初終於再也挺不住了，哥大一步一步的放棄古典語文作為入學及畢業資格的要件，終而在 1916 年全面棄守。這樣的棄守宣告了一個古典傳統的終結，也開啓了一個新的局面。

入學條件及畢業資格要求的改變，使得哥大學生的組成起了大的變化。公立中學的學生及新移民子女，在舊制度之下要進入哥大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在新的制度下，哥大的大門廣開，學生來源大增，學生的背景也趨向多樣化，代價則是哥大再也無法維持它歷年來的士紳傳統。這樣的改變說來不是壞事，哥大學生來源多元化的發展，使得這老大學添增了開放多元的氣象，也帶進了智能上的新活力。雖然哥大的門戶洞開，但哥大的理想始終如一。在古典語文及古典學科取消之後，取而代之的是經典閱讀。1917 年，哥大教授 John Erskine 設計了一項通識課程(稱之為 General Honors Course)，參與這課程的學生要每星期研讀一部西方經典，如此的設計著眼於學生人文素養的陶冶，而不是專精能力的培養，讓以往沒有機會接觸古典教育的學生，在大學中仍有機會透過經典的研讀來接觸西方的精粹文化。如此的課程也是後來芝加哥大學經典閱讀的先聲。

Bell 告訴我們，1919 年可說是現代哥大實際誕生的一年(別忘了，哥倫比亞

大學名教授杜威當年正在中國展開為期兩年的講學)。在這一年，現代哥大確立了兩件事：一是哥大的大學部還是以博雅通識為主，要促使學生接觸主要的思想觀念和擴展視野暨想像；二是學生來源的多樣化。

大致來說，哥大教育的博雅理念是靠三類知識領域來落實，一是「當代文明」、二是「人文學科」(包括文學、哲學、音樂及藝術的經典作品)、三是自然科學(作法較有彈性)。1919年後，隨著社會的變遷及專業化的壓力，哥大的通識博雅課程的年限及內容時有調整，但其理想始終沒有改變。

哥大的與時俱進也同樣的發生在哈佛及芝加哥大學，也就是在專業化和專精化的壓力之下，三所大學的通識理想始終沒有屈服。這種堅持倔強的背後其實是西方啓蒙的理想。在啓蒙精神的引導下，一個人之所以有其尊嚴及價值，正在於人的獨立性及自主性，人應該是自己的主人。而三所大學的通識理念就執著於此。人需要了解自我、自己所承載的傳統，所居的社會及所處的自然世界，透過這種了解，人才可望做個清明的人，才可望擺脫自然世界和人文社會世界加諸於己身的羈絆。大學的最基本任務即在於此，而通識或博雅的教育就是達成此種目標的方法。這種理想的堅持，或是人想成爲「人」的堅持，可說就是三所大學在歷經社會變遷之後，仍然堅持通識教育理想、也仍然實施通識教育的最主要原因。

理論的實踐與彈性的實踐

在 Bell 的筆下，三個各有擅場的大學之中，他最肯定的其實是哥倫比亞大學。哥大的通識教育引領了美國高等教育的風騷，也反映了美國社會中的內在矛盾（經典閱讀的理念與民主理念有其緊張的關係）。芝加哥大學通識教育的背後總是赫欽斯。赫欽斯在 1936 年勾勒出來的通識教育和大學的理念引領了芝加哥大學的發展，但 Bell 告訴我們，赫欽斯給芝加哥大學的藍圖從來就沒有落實過。哈佛大學在二戰結束後通過的紅皮書裡，也詳細的替美國中學及大學規劃了一套理想的通識教育課程，但很遺憾的，這套藍圖雖然參考了哥倫比亞和芝加哥的經驗和構想，但在 1949 年實施時卻有了很大的改變，所以紅皮書的藍圖也並未真正的在哈佛大學推行。相較之下，哥倫比亞大學在推行通識教育所根據的杜威實用主義精神，卻讓哥大在變動的時代裡，能視情況的調整通識課程的內容，使得哥大的通識教育能一直保持其多元、活潑與彈性。

Bell 對三所學校的觀察也許有獨厚哥倫比亞大學的地方，但他傳遞的訊息對我們當下台灣的通識教育卻可能有些幫助：通識教育的推動在維持既有精神的前提下(民主社會共識的建立、個人自主能力的陶冶、因應知識的快速成長與專精)，應儘量求其作法的多元、彈性和活潑。